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本《钱塘集》考述*

潘 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 要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钱塘韦先生文集》十四卷,是北宋士人韦骧的文集《钱塘集》现存唯一的宋刻本,并且为通行本的祖本,其中保存有多篇不见于通行本的佚诗、佚文以及韦骧自注,对研究北宋政治生态、文人交游活动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直以来,学界通行的《钱塘集》版本是光绪年间刻印的《武林往哲遗著》丛书本(以及依据该本整理的《全宋诗》《全宋文》),而该本实际与宋本《钱塘集》原貌相去甚远,并漏收诗文和大量韦骧的自注。考察静嘉堂本《钱塘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宋代文集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关键词 《钱塘集》 韦骧 《全宋诗》《全宋文》 静嘉堂文库

DOI: 10.13663/j.cnki.lj.2021.10.021

A Study on the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Qiantang Ji* Held by Japan's Seikado Bunko Library

Pan Chao (School of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urteen volumes of the *Qiantang Ji* held by the Seikado Bunko Library in Japan are the sole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Qiantang Ji*, by Wei Xiang, a schola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prevalent edition. There are many lost poems, essays and Wei Xiang's self-annotation, absent from the current edition, showcasing historical value for study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ctivities of literati communic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popular edi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Qiantang* in academic circles is the *Collection of Wulin Wangzhe* engraved during the reign of Guangxu (and *Quan Song Shi* and *Quan Song Wen* compiled based on this book). The Guangxu edi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Song block-printed version, and had omitted several poems and self-annotations of the author. By examining the edition held in Seikado Bunko, we can shed new light on its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Qiantang Ji*, Wei Xiang, *Quan Song Shi*, *Quan Song Wen*, Seikado Bunko Library

1 韦骧与《钱塘集》

韦骧(1033—1105),字子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任兴国军司理参军、婺州武义令等职,元祐七年(1092)召为尚书主客郎中,后出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建中靖国初知明州,后改提举洞霄宫致仕,崇宁四年(1105)卒。韦骧少有文名,年十七,以文章进谒王安石,王安石“见其《借箸赋》,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吴越,见文士唯子与董顾行耳’,由是籍甚。当时每一赋之成,学者争传诵之”^[1]。其诗文在后世也颇受瞩目,《四库提要》称其文风:

观其气格,大抵不屑屑于规模唐人,而密咏恬吟,颇有自然之趣。杂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启为尤工。其精丽流逸,已开南宋一派。虽未能接迹欧、梅,要亦一时才杰之士也^[2]。

据陈师锡撰《韦公墓志铭》,韦骧生前“料理平生文稿”,有赋20卷,生前已“行于世”,今已不存;又编订文集《钱塘集》20卷,生前一直未能付梓,直到南宋乾道四年(1168),其孙韦能定知汀州,将家藏文集刊于

*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日本史料所见民国藏书楼的管理与藏书聚散”(项目编号:2018HW026)的研究成果之一。

临汀郡庠，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书尾有韦能定所撰跋文，详述经过：

先大夫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参议携往别墅，最后二卷遗失，不可复得。能定大惧岁月浸远，复有亡逸，以隳先志，谨命工镌木于临汀郡庠^[1]。

从跋文可知，该本是《钱塘集》最早的刻本，在付梓之前，文集已非完帙，集中最后两卷已遗失，故仅刻18卷。查历代官私书目，除此宋乾道本之外，宋、元、明间未再有刻本著录，导致后世传本稀少，今天最常见版本乃《四库全书》本和光绪二十二年丁氏刊《武林往哲遗著》丛书本两种，尤其是后者，一直以来被研究者认为是“完善而又易得”。清光绪年间，钱塘人丁丙与其兄丁申采辑乡邦文献编纂《武林往哲遗著》丛书，从杭州吴氏瓶花斋处获得“吴氏从乾道本影写”并“校正”的《钱塘集》抄本，于是召工刻梓。由于该本的底本——瓶花斋抄本声称“影宋”，而依据该抄本再刻的《武林往哲遗著》本又颇为常见，所以现今通行的《全宋诗》《全宋文》均使用《武林往哲遗著》本为底本整理，但据笔者的研究，该本并未真实反映宋刻本的文本原貌，存在极大的文本问题。《武林往哲遗著》本的祖本宋乾道本今天仍然保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中，笔者在调查该本时，注意到了《全宋诗》《全宋文》中未著录的佚诗佚文7篇，以及130余则韦骧的自注。

静嘉堂所藏宋刻本《钱塘韦先生文集》，原刻18卷，现存14卷（阙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半叶10行、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版心上方镌本叶字数，下镌刻工名，如杜明、官太、叶从、刘昌、刘三、吴正等，多是南宋乾道淳熙间福建、江西地区的刻工。又宋讳中不避扩、匀、敦等字，避讳至慎字，正文中遇“构”字则空阙，题“太上皇帝御名”。该本又避家讳，书后附录的韦骧墓志铭中，韦骧之“骧”字，其祖父韦镐之“镐”字、父韦杲之“杲”字，以及文集刊刻者韦能定之父韦寿隆之“隆”字，均阙末笔；集中“襄”字亦阙末笔，可知此本即是韦能定于孝宗时刊印的乾道本之原刻^①。1929年傅增湘访日，与长泽规矩也等人

至静嘉堂文库访书，非常敏锐地发现此本正是四库馆臣所言的吴宽藏宋本，称之为“海内孤帙”，随后寄书与张元济，认为此次发现乃“此行最快意之事也”，并建议张元济摄影印行^[4]。

此本在清末流入陆心源诂宋楼后，陆氏在《诂宋楼藏书志》中将此书错误地著录为明刊本，但在编著《群书校补》时又改称“余所藏乾道刊本”^②；1907年诂宋楼藏书被出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此书也被捆载而东，傅增湘在静嘉堂文库检视后确定为宋本，并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

《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宋韦骧撰，存卷三至十八，凡十六卷^③。宋刊本，陆心源氏原题明刊……按：此本实为宋刊，且属初印精湛。卷中宋讳亦缺笔，未审陆氏何以疏率至此，题为明初刊^[5]。

从避讳、刻工、刊行跋文及版面风格来看，此书确是宋刻无疑，经傅增湘、傅熹年等多位学者鉴定，已成今天学界的共识^[6-8]。

静嘉堂本不仅是现存唯一的宋刻本，还是现存如《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图藏清抄本（甲、乙两部）等传本的祖本。据《四库总目》记载，四库本的底本“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是一部抄本，此本缺卷一、卷二、卷十七、卷十八，仅14卷^④，馆

① 本文所作调查依据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静嘉堂宋元版胶卷。

② 见《群书校补》卷七十书前提要，又该书目录仍题作：“明覆宋本”，一书之内前后矛盾若此，似可证陆氏著述多非自著，而是门人所作，或“多有蓝本”的传言。

③ 应为14卷。《诂宋楼藏书志》著录此书：“原阙一、二两卷”，共16卷。傅增湘1929年访日时目验此本，在随后与张元济的信中记“今本仍十四卷”“四库所收亦只十四卷”，但后来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著录为16卷，前后矛盾。以昭和三年（1928）藏书为对象著录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年出版）著录：“卷一、二、五、六阙”，可推测“十六卷”当是傅增湘误记。又不知五、六卷尚存于天壤间否。

④ 《总目》及卷前提要均著录14卷，但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仅有12卷，缺卷十三、卷十四（即静嘉堂本、武林本之卷十五、十六），原因待考。

臣从该抄本的避讳判定该本是“由孝宗时刊本传抄”，且该抄本有收藏家题识“宋板《韦骘集》，系明吴宽家藏本，原阙第一、第二卷，实止十四卷”，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就静嘉堂本和“明吴宽家藏本”的关系做了论证：“昔传明吴匏庵藏宋刊本，缺第一、二卷，此本所缺正同，必为吴氏藏本无疑也”，认为静嘉堂本即是明吴宽所藏的宋刻本，则四库本的底本源于静嘉堂本。其实不仅四库本，现存版本中如《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家图书馆藏两部清抄本的底本，也均源于静嘉堂本。首先，各本序跋描述的底本特征与静嘉堂本完全一致，丁丙在刻书序中云：“此本为吾杭瓶花斋吴氏从乾道本影写，敦复上舍复加校正。‘构’字注‘太上皇帝御名’，‘脊’字注‘今上御名’，每页二十行^①，行二十字”；《四库提要》描述底本则云：“检勘书中，凡‘构’字皆空阙，而注其下云‘太上皇帝御名’，当由孝宗时刊本抄传。特所阙两卷，诸本皆同”；国图藏有两部清抄本，其中甲本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吴允嘉的跋语，称该本抄自“瓠庵（即吴宽）先生槧本”，是“槧本之苗裔也”，都与静嘉堂本特征与来源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笔者又比较了诸本的文本，发现静嘉堂本中因为纸张破损而导致文字缺损之处，文渊阁四库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的相应文字也都付之阙如（《全宋文》《全宋诗》均阙文），如静嘉堂本卷十五有多处纸张破损，其中无法辨明的字句，各本均空白，或注明“原阙”，如卷十五中的《答陆君仪书》，静嘉堂本残损严重：

其所论□□若不相似，然□□所谓悖者，嗟其死之悖理耳。今虎有深山□□不□□守而反宣恶城市，以取毙路，是亦死之悖理也□□可悖之然也。

将之与《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图藏清抄本一一比对，可以发现这一段文字，诸本也都有阙文，且与静嘉堂本的残损处一致。由此可以证实以上诸本的底本是静嘉堂本在传抄流传中的“苗裔”。

2 静嘉堂本《钱塘集》所存佚文佚注

由于静嘉堂本藏于海外，所以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未能对《钱塘集》的原貌展开深入研究^②；加之一直以来最易见的《钱塘集》版本是《武林往哲遗著》本（“今宋本不易睹，以此本完善而又易得”^{[6]392}），所以今日通行的《全宋诗》与《全宋文》均以该本为底本整理，但该版本实际上存在很大的文本问题。虽然丁丙在序文中言“此本为吾杭瓶花斋吴氏从乾道本影写”“犹存宋槧之旧”^[9]，然而将《武林往哲遗著》本与静嘉堂本比勘，尽管在行款和阙叶上，确如丁丙所言，瓶花斋吴氏抄本部分保留了宋乾道本的面貌，但是从文本内容上来看，问题颇多，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漏收部分诗文；第二，漏收大量韦骘的自注，部分小注张冠李戴，造成了文本的混乱。经过比勘，四库本、国图藏清抄本（两部）也均存在相同问题，可知静嘉堂本虽为诸本之祖本，但诸本并非直接抄自静嘉堂本，而是共同源于某部抄写不精的静嘉堂本的传本。以下依据静嘉堂本具体考察通行本《钱塘集》中存在的文本问题。

2.1 佚诗文

静嘉堂本《钱塘集》存有《全宋诗》未收诗6篇，《全宋文》未收文1篇，经笔者查验，《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本、国图藏清抄本中亦无此7篇。这6首诗有1首在文集卷四，5首在卷八中，题目与具体内容如下：

（1）静嘉堂本卷四^③《咏唐史》组诗中第二十四首

《钱塘集》中有一组重要的七言咏史诗《咏唐史》，共30首，每首咏一两位唐代人物，

① 此处指整页20行，即半页10行。

② 涉及《钱塘集》版本的研究，有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张鹤《韦骘及其诗歌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朱倩倩《北宋士人韦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等，但尚未对静嘉堂本的文本进行深入考察。

③ 本文所言“某卷”均指静嘉堂所藏宋刻本的卷次（武林本、国图清抄本同），由于四库本的底本缺第一、等二卷，在抄写时“以第三卷为第一”，改变了原书卷次。为了行文方便，也为了保存原本面貌，本文以静嘉堂本为准。

句下有韦骧自注，注明出处。今《全宋诗》中仅存29首，且题为《崔尧》(第二十四首)所咏诗句“执政如何事佛淫”“身附奸邪不知祸”与崔尧生平事迹不符，今据静嘉堂本可知，在原文集中，第二十四首为《崔尧》、第二十五首为《王缙》，而《全宋诗》中题为《崔尧》的诗原是第二十五首《王缙》的内容，不知何故误刻入崔尧名下，而《崔尧》原诗却被刊落。此外，静嘉堂本中还保留了韦骧的自注，今将第二十四首、第二十五首诗作以及韦骧自注一并录出，以存其真：

《咏唐史》组诗第二十四《崔尧》：

只观庭树答言早，土木当须起怨憎。须发莫嗟遭剪削，当时不死是难能。韦骧自注：尧为陕州观察，民诉旱，尧指庭树曰：‘此而有叶，何早之有？’乃答之。后为军人所俘，剪其须发，拜而获免。

第二十五《王缙》：

大臣许国当由道，执政如何事佛淫。身附奸邪不知祸，却谈报应感君心。(《全宋诗》中该篇被误置于《崔尧》题下)

“身附奸邪不知祸”句尾有韦骧自注：谓附元载役，遭黜。

(2) 静嘉堂本卷八《烂溪道中》

寂寞缘溪道里赊，林坳时见两三家。丹枫竞带衔山日，白鹭双翘出水沙。满袖风霜情惨淡，随轩牒诉语呕哑。但嗟未有归休地，矍铄精神莫漫夸。

按：在静嘉堂本中，此诗后一首为《度烂溪》，疑两诗诗题相近，故抄写时失收。烂溪又名澜溪塘，位于吴江市境内。据明代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三记载：“烂溪在永新泾东北二十里，南滨桐乡县者为东烂溪，又东行二十里，出秀水县界，北入吴江县莺脰湖。”^[10]

(3) 卷八《又和公仪岁暮书怀用前韵》

囊封奏了抖尘衣，恳乞琳宫欲傲时。高踞未能离省闼，清谈犹可共书帷。交情孰拟同年厚，诗债毋嫌隔岁迟。窃觐朝廷留旧德，孤怀真若解禁丝。

按：在静嘉堂本中，此诗前一首为《和刘公仪索和诗次韵》(通行本均脱“刘”字)，疑

诗题相近故失收。刘公仪，合州(今重庆合川)人，皇祐五年进士，与韦骧为同年，韦骧集中屡见与其唱和之作。

(4) 卷八《胡右丞挽词二首》(其二)

讣闻簪绂共伤神，尽叹熙朝失正人。谁谓钧陶天下手，便为寂寞冢间身。高文辉映诸儒旧，清德流传万古新。归葬东吴秋已暮，素旌哀挽惨江滨。

按：静嘉堂本卷八《胡右丞挽词》收诗两首，而《全宋诗》仅存1首。所挽当是胡宗愈。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名臣胡宿之侄。胡宗愈亡于绍圣元年(1094)，诗中有“归葬东吴秋已暮”之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是年。本集卷九有《贺谢中书胡舍人》。

(5) 卷八《邓左丞开府挽词三首》(其二)

礼闱被召耸诸生，政府摅才道始行。岂谓桑榆逢急景，不容膏泽饫群情。致尧终保初心固，夺绾俄嗟旧事轻。赖有后来书信史，悠悠千载享荣名。

(6) 同上(其三)

真贤顺化只逡巡，英气飘然岂易沦。不逐张良从隐逸，应随传说上星辰。高文与世为矜式，淳德何人继后尘。追慕门阑多感激，寓词哀挽泪沾巾。

按：静嘉堂本卷八《邓左丞开府挽词三首》收诗3首，而《全宋诗》仅存1首。诗中所挽当是邓润甫。邓润甫字温伯，建昌军南城人，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拜尚书左丞；卒于是年，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安惠。据此知该诗当作于绍圣元年。今集中有《胶州道中逢九日呈温伯舍人》《和温伯道见寄》等作品。

(7) 卷十二《谢中京留守请赴筵》

道出名疆，方忻良遣，书贻厚意，特枉宠招。其在烟蓑，曷胜愧荷！

按：该文为卷十二《代鸿胪陈卿使北表》中的一表，查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神宗元丰七年(1084)八月，鸿胪卿陈陟为辽主生辰使出使辽国^[11]，该文当作于是年。

2.2 佚注考

静嘉堂本中保存有大量不见于通行本的韦骧自注，从内容上看这些自注可分为三类：

(1) 交代典故出处或用前人成句

《钱塘集》中的咏史组诗《咏唐史》共30首,每首句下有韦骥自注(共61则)。在通行本中这30首诗只有第一首《李卫公》和第二首《李英公》部分保留了小注,其余小注均已不存。这些自注对于理解作者的作诗用意十分重要,如:

尹思正 注:赠黄门监

执笔威逾知一杖,忤权活得月将身。

韦注:同侯知一为司府少卿,吏人诗曰:不畏侯卿杖,唯畏尹卿笔。

韦注:韦月将告武三思变,中宗欲斩之,思正执笔,奏配流,三思令所由非法害之,思正又固争,得免。

位终八座非为幸,埋戟相符岂不神。

韦注:为少卿时,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门加荣戟。

李朝隐 注:赠吏部尚书

拽宦鞭奴蔑贵权,当时风角^①慢衣冠。

注:睿宗朝为长安令,有宦官关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开元中为河南尹,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平人,乃执而杖之。

及为御史声名减,岂是官高便欲安。

韦注:为御史大夫。

此外,如卷四《和公余言怀》中“敢希成大器,唯恐近污渠”句下有小注“韩退之诗有‘清沟映污渠’句”,则注明用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意。卷七《和山行回坐临清桥啜茶》中“桥上茗杯烹白雪,枯肠搜遍俗缘消”句下注“卢全谓‘两碗搜枯肠’”^②,注明用卢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意。卷八《和子方赠祖夷仲提刑》中“行见荆清八州境,里言应不咏桓东”^③句下注“尹赏为长安令,辟地为虎穴,捕恶少数百人,以次内穴中死,与瘞寺门桓东,揭书姓名。道路歌曰‘安所求吾子,桓东少年场’”,则用西汉酷吏尹赏事。

(2) 日记作诗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

卷三《杨内翰读书堂》题下注明诗中所咏读书堂“在锦竹无为山”。卷七《吴六合道原席上》题下注“时乡人金推官在坐”;同卷《偃盖松》题下注“本在琅邪山,见于王元之八咏”。卷八《自剑还道中寄同事苏进之》记

作诗时间为“十一月八日”;同卷《宿上亭驿》题下注“是夕大风小雨,翌日晴和,谒潼江英珙王庙”;《师子峰》题下注“建宁县双溪驿之西,俗谓三郎石”;《题尤溪县林平铺壁》题下注“是日过黄山岭至此”。这一部分自注多为题下注,阐发作诗要旨,注明创作诗歌的时间和具体情境,为后人理解和分析诗歌提供了注脚。

(3) 自注本事,或解释当时情事,或解释作诗作文之由

通行本对诗题删略颇多,如卷八《和曹子方》,在静嘉堂本中则作《和曹子方见庆嗣子推官自太原教授移彭泽令还侍于建安次韵》,原题中注明了唱和诗的缘由、人物等信息,而通行本中皆不存。该诗尾联“凤毛池上他年贵,谦晦终难掩道耕”后有自注云:“令子秀整而强学,而来诗过形谦抑,有只堪餉耕之句,故以是答。”某些诗如果无作者自注,则让人颇费思量。如卷八《谢岩起惠支颐二首(其二)》“儿女环观齐指笑,朱颜犹未怯双莲”,儿女因何发笑?“双莲”为何意?静嘉堂本诗后有自注云:“所惠支颐,承以卷荷而辅以双莲。”《过桐庐郡》诗后小注谓“范文正有潇洒桐庐郡十咏”,以释诗中“潇洒旧闻名”之句。卷七《蔡仲远内翰出虢州刘龙图所寄诗因次其韵》有小注:“来诗有烦问禅伯之句,故以是云”,以释“内阁旧交诗远寄,心期犹未许裴休”句。卷七《想庐山三首》之一“二林咫尺还淹兴,空读美庐易览书”句下注“近儒有庐山易览图行于此”^④。卷四《摄户纠二曹诗因自戏》“却笑近贤衙署贵,时人虚号一条冰”,静嘉堂本自注云:“近世陈彭年在翰林所兼十余职,皆清要,时人谓其署衙为一条冰。”同卷《谢董都官见寄》诗后自注云:“来诗有‘平反好积于公德,行见高门驷马还’之句,

① 《全宋诗》与武林本均作“风骨”,四库本作“风角”。武林本源于宋刻本,知为后人妄改。

② 卢全原诗作“三碗搜枯肠”。

③ 武林本等作“垣东”。

④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陈舜俞《庐山记》书首有俯仰图,标明100多处庐山的寺院台观,陈舜俞生活时代与韦骥相近,符合“近儒”之说,《庐山记》书首之图或即此处所谓“庐山易览图”。

因以此答”，用以解释尾联“听狱平反愿承教，异时安敢议高门”。卷八《和盛中叔侍郎斋宿唱酬》“共庆球琳已华国，独惭樗散漫先春”句末有小注“非材窃第，愧先半纪”，不如此解释两人的关系，便不清楚此句的用意。

3 佚注中所见作者生平

韦骧集中诗文多无明确纪年，而自注中所记年月、地点、事件则展现了诗人生活的丰富细节，为研究韦骧生平提供了线索。如卷七《又和锁宿即事》诗后有小注注明“乙丑正月丁未入院，十八日癸丑和此”；卷八又有诗《同文馆试上舍和同事孔彦常学士即事》句尾也有自注云“次日奏号”，知韦骧曾在同文馆试太学上舍生，此次唱和活动应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正月，与张耒、晁补之等人的同文馆唱和相差一年。此时韦骧在京城任主客郎中，主客郎中在元丰改制后领礼部主客司事，掌接待外国朝贡等事^[12]。

卷七《又和九日有怀见寄》“酒阑忽忆胶东路，跋马随轩望上都”有小注“癸丑从辟，以九日过胶水”，此诗是韦骧写给友人邓润甫的，邓润甫为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于熙宁六年被命以京东路察访一职赴山东察访^[13]，可知韦骧亦曾参与此役^①。

卷八《遂明生日》题下注“四月六日”，遂明即“乌台诗案”主谋之一的张璪。韦骧与张璪交好，并为其撰写行状。张璪的生年不详，《全宋诗》《全宋文》皆阙如，此一小注是张璪生平的重要史料。

此外，如卷八《寄陈安道同年》“折桂交游三纪外，系匏踪迹两溪滨”句后有小注“君居信溪而予居建溪之滨”，知此诗作于福建转运判官任上。《和子方赠祖夷仲提刑》有“梁汉曾嗟失高躅，瓯闽幸迟扩前功”之句，两句后分别有小注“予领漕利路而公已罢使归阙”和“公旧宰福之宁德”。《九日示寿隆》有“明年汝对陶公菊”句，下有小注“时寿隆待彭泽令阙”，韦寿隆为韦骧长子，据此诗可知其此时正待江西彭泽令阙。

静嘉堂本保存的130余则小注，全面展示了作者的生平交游，由于系作者的自注，其史料价值相当高，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珍贵的一手史料。

4 结语

静嘉堂所藏宋刻本是现今《钱塘集》通行本之祖本，其中有数篇佚诗、佚文未见于《全宋诗》《全宋文》，并保存了大量韦骧的诗文自注。此集为韦骧生前亲自编订，从这些自注的口吻来看，应是韦骧晚年编纂文集时所作。韦骧晚年通过注释旧诗文，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和总结，因此这些自注是研究宋代文人自编诗文集意识的一个极佳的实例，也可借此了解韦骧的生平与交游。此外，通过考察静嘉堂所藏宋刻本的文本，可知《全宋诗》《全宋文》所据之底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并未真实地反映宋刻本的文本原貌，该本存在不少的文本问题；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钱塘集》的存在，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宋代文集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陈师锡. 韦公墓志铭[M]//钱塘韦先生文集. 静嘉堂文库藏宋乾道刻本.
- [2] 纪昀,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052.
- [3] 韦能定. 钱塘韦先生文集跋[M]//钱塘韦先生文集. 静嘉堂文库藏宋乾道刻本.
- [4] 张元济, 傅增湘.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210-211.
- [5]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38.
- [6] 祝尚书. 宋人别集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7] 严绍璁.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521.

- [8] 傅熹年. 参观静嘉堂文库札记(下)[J]. 书品, 1991(2): 59.
- [9] 丁丙. 钱塘韦先生文集跋[M]//钱塘韦先生文集. 清光绪二十二年丁氏刊武林往哲遗著本.

① 清人唐仲冕《岱览》、金荣《泰山志》等书收录泰山韦驮殿石柱上题名“秘书丞韦骧、著作佐郎张耒、衢州判官杨于，从谏院舍人邓公察访东州，便道游灵岩，过夜遂宿。熙宁六年十月中秋”。